

毛泽东政治协商的价值目标、 基本职能与中国特色^{*}

李雅兴 孙 雨

〔摘要〕 政治协商是一种内生于中国土壤，与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民主形式。毛泽东是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奠基者、制度创立者和实践开拓者，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问题开展广泛的政治协商。在政治协商过程中，他紧紧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价值目标，充分发挥政治协商的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和科学决策的基本职能，协商建立了新中国。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团结多数、尊重少数，相互监督、荣辱与共。

〔关键词〕 毛泽东；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价值目标

〔作者简介〕 李雅兴，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 雨，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湘潭 411105）。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① 政治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作为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奠基者、制度创立者和实践开拓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开展广泛协商，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思想。深入探究毛泽东政治协商的价值目标、基本职能与中国特色，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及其对加强政党协商建设的意义研究”（16BKS015）的阶段研究成果。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一、毛泽东政治协商的价值目标

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毛泽东政治协商的重要价值目标。

1. 民族独立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环伺宰割，掠夺中国物质财富，践踏中华文化遗产，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挽救民族危机，摆脱帝国主义的支配，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论封建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救国方案均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说明，“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①。没有独立民主，中国的事情就难以办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毛泽东政治协商所要实现的重要价值目标。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国和民族独立事业而奋斗。这一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其中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最早响应，发表了《告同志书》。1936年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公开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高度评价了共产党联合各党各派各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号召建立抗日组织救亡阵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该文一发表，便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和采纳。毛泽东为此向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位先生致函，明确表示共产党同意他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愿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体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独立的愿望，民主党派也纷纷希望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国家，其中中国人民救国会明确地阐述了这一主张，其宗旨便是“团结国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的新中国”^②，与中共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奠定了开展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联合抵制违反政协（旧政协）决议精神的国民大会，民盟主要领导人表示“民盟同共产党的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③为和平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④，获得了他们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1页。

② 汤涛《开国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4页。

共和国的成立”^①，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开展政治协商始终坚持以实现民族独立为价值目标。

2. 人民解放

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之下，过着颠沛流离、苦雨凄风的生活。人民迫切盼望有先进政党能够带领他们跳出被奴役的泥潭，摆脱被支配的命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实践中，始终坚持以实现人民解放为重要价值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这一协商合作平台，凝聚抗日力量，为人民解放而共同奋斗。1938年2月，解放行动委员会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期间，章伯钧、彭泽湘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进行了会谈，加强了双方合作关系，对解放行动委员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放行动委员会指出：抗战利益包含一切人民的利益，全国上下应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致团结抗日；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主张：要建立民意机关，给予人民参政权利，选出代表组成“全民救国代表大会”。此主张与共产党的民主抗日主张一致，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与民主共同推进，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②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建立了边区参议会制度，“使旧中国社会最底层、最没权利、没文化的广大农民成为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主人”^③。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与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实现人民解放为价值目标开展协商合作，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已被歼灭，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想通过假和谈争取喘息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号召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中国致公党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表明愿和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九三学社许德珩等表示拥护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指出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和平民主的中国才能建立。为筹备新政协，相继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揭露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以政治阴谋拖延时间，作最后挣扎的企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④。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

①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页。

③ 李建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④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6页。

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争取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可见，政治协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和各党各派各族各界争取人民解放全过程。

3. 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是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是使中国“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②，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中国社会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工业基础落后，农业减产，交通梗阻，商困于途，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亟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开展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建设，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为实现国家富强奠定制度和物质基础。

土地改革运动实质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运动，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高度重视土地改革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为何改”“如何改”“何时改”三个问题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沟通交流，达成共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负责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分别作了大会发言，代表各自党派表示支持土地改革。李济深表示：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中国人民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张澜指出：土地改革是彻底的革命，是中国人民着手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新国家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号召全体盟员和全体人民拥护和执行土地改革，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等等。^③会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动员本党成员参与土改运动，推动土地改革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国民经济趋于稳定。

1952年底，土地改革完成，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一化三改”的总任务，即“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④。关于如何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人士李济深、陈叔通、章乃器、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章伯钧、程潜、黄炎培等进行协商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系统阐述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方式、时间和利润分配等问题，减少他们的思想顾虑。经过多次思想沟通与协商讨论，民主党派和中共达成共识，表示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民主党派中央陆续召开会议，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民主建国会号召全体会员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私营工商业者，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③ 崔珏《中国民主党派地位的历史演变》，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路线而奋斗”^①；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的黄炎培还亲自率领工作组赴上海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带动和影响更多的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积极拥护和投身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国家富强准备了必要条件。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富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

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②，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族各界代表在协商合作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政治协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和科学决策的基本职能。

1. 资源整合

通过政治协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资源整合作用。民主党派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救国会中的文化界人士充分利用报社资源，以《大众生活》和救国会的机关报《救亡情报》为宣传阵地，通过发表一系列文章，号召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宣传抗日主张；通过悼念鲁迅的活动发动了一次群众性的救亡图存运动；其他民主党派也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努力促进全民族联合抗日，推动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整合各方面社会关系，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提供给解放军；民盟、民革等党派利用与国民党部分成员的关系，协助共产党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部分民主党派还积极组织武装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等等，这些活动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从原来没有中央政府的、分散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创建全国性的政权”^③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于筹备建立新中国，需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聚在一起共同协商，但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在南方，中国共产党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关系和力量，秘密地安排“七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共一千多人相继北上，汇聚东北的哈尔滨、沈阳和华北的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④，而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民主党派积极协助共产党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民建主要是由民族工商业骨干组成的政党，其所联系的人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重要影响。1955年4月，民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民建担负着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任务，号召民建会员争取做工商界的骨干分子，以自身行动带动其他工商业者接受改造，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增加助力，减少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私营企业主动申请公私合营，实行

① 崔珺 《中国民主党派地位的历史演变》，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②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

③ 陈扬勇 《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④ 李捷 《毛泽东与新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国家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张敬礼担任总经理的大生公司，担任天津市民建主委的李烛尘的久大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等等。随后，民建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刘国钧也纷纷申请将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或者成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他们影响下，更多私营公司主动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1956年1月，北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许多城市都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民主党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将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到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2. 利益协调

政治协商可以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不同协商代表分别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体的利益，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主张和见解上难免存在分歧。1949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起草完成后，中共中央让哈尔滨的民主代表传阅并讨论，讨论中，民主党派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关于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这个问题就存在分歧，大多数民主人士还是赞同使用新民主主义，但是部分民主人士受国民党统治影响，对共产党政策缺乏了解，思想还未完全转变，“还是向往旧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①；有的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还有的主张在《共同纲领》中不写新民主主义，代之以“民主主义”，等等。中国共产党通过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与民主党派直接接触沟通，交换意见。周恩来向他们解释：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轮流坐庄或相互竞争，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政治合作使各民主党派向着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②中国共产党以协商座谈等方式澄清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有效发挥了政治协商的利益协调职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关于如何进行土地改革、是否要出兵援朝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土地改革与民主党的切身利益相关，有的民主人士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过激太严格，表示不赞成；有的对土地改革政策存有疑虑；有的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进行土改。经过多次协商座谈，民主党派逐渐提高了认识，表示支持土地改革政策。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界，唇亡而齿寒，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但是当时民主党派中有不同声音，部分民主人士对美国的强权有所忌惮，对出兵朝鲜存有顾虑，有的认为应该集中精力搞建设，不希望参战；周恩来、李维汉为此与民主党派进行了多次协商座谈，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说明美国侵略朝鲜对我国安全的影响，经过深入了解抗美援朝的利弊，民主党派表示赞成抗美援朝，并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联名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通过政治协商畅通了民主党派意见表达渠道，使人民在交流沟通中达成共识，协调利益关系，化解误会和矛盾，避免问题

^① 陈扬勇 《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45页。

^② 参见石光树编 《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激化。

3. 科学决策

政治协商可以有效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通常来说，政治决策是在获得多方信息、充分了解政策对象意见基础上作出的，而群众意见最开始往往呈现离散状态，存在碎片化问题。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党和国家广泛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意见建议得以有效聚合，通过协商讨论，使其进入政策决策系统，体现在最终决策之中，增强决策的民意基础，切实提高决策质量。1941年，陕甘宁边区遭遇空前的物质困难，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包围和经济封锁，一方面，党政军脱产人员大量增加，边区财政支出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封锁，边区财政收入锐减，财政十分困难，人民负担重。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共产党要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并鼓励参议员多提意见。开明绅士李鼎铭基于陕甘宁边区的困难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案，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精兵简政是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经过大会代表讨论，参议会通过了这一议案。会后，陕甘宁边区实施了精兵简政方案，整顿党、政、军组织机构，精简军队冗员，节约了财政开支，提高了工作机构效能，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由此可见：精兵简政是经过政治协商形成的符合现实情况的科学决策。

政治协商承担着收集方方面面民意信息的责任，通过理性辩论和反复沟通，可以使与会代表全面深入理解所讨论议题，进而作出更优决策。新中国成立前夕，关于新中国的国名，就是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的科学决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和张志让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每个字都有意义。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最终决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因为“人民”已经表达了“民主”的意思，不必再列出。在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参加政协的各个单位通过协商平台均发表了意见，表达了自身对《共同纲领》的要求，起草小组集中广泛意见和普遍意志，数易其稿，才最终定稿，其中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纲领起草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共计七次大的讨论和修改。此外，政协各参加单位内部还进行了讨论。经过这一过程增强了《共同纲领》的科学性，提高了《共同纲领》的社会认可度。政治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①，通过不断协商修正已有观点，完善已有认知，最终形成共识，维护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三、毛泽东政治协商的中国特色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② 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82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页。

中逐步形成发展的，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团结多数、尊重少数，相互监督、荣辱与共。

1.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①毛泽东政治协商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形成的，分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提供了广泛的力量支持。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各党各派各族各界的合作实践中，以科学的政策、真诚的态度、模范的工作，说服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中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坚持共产党对政治协商的政治领导，有助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地位上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政治协商中，“民主党派……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与独立的话语权”^②，可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国是。毛泽东在建立“三三制”原则之初，就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③。共产党要认真与党外人士开展协商合作，倾听党外人士的诉求与主张，诚恳地与党外人士商量解决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④1949年9月，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合作的政治格局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促进了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历史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⑤

2. 团结多数、尊重少数

政治协商通过协商合作机制团结大多数人。刘少奇曾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⑥。通过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为各党各派各族各界代表搭建了知情明政、参政议政的平台，如“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双周座谈会等等，加强了党派间的联系，推进各党各派各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② 许奕锋《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2页。

族各界的代表团结合作。从协商主体来看，参加政治协商的代表们分别联系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群，代表性强，联系广泛。正如毛泽东所说：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从民主党派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来看，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民主党派人士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有许多人具有丰富的城市管理与经济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参与巩固国家政权与经济建设实践，带动所联系群众投身实践，有效发挥政治协商的团结作用。

政治协商通过民意表达机制使各种诉求得到充分反映，既吸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经过协商达成共识，反映民意。需要注意的是，民意不同于众意，众意是经过投票选出来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反映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少数人的意见未在最终决策中体现。而民意“则不包含选择，不经过筛选，各种不同的诉求、意见、偏好都囊括在内”^①。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向奥巴马阐述中国对民主主权理解时所说：民意我们追求的比西方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政治协商“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②，协商主体的意见都会被倾听，少数人的意见也会得到尊重。毛泽东特别注重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指出：“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③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对新中国的制度设计，难免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争论，但即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被认真对待。参与起草《共同纲领》的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评价说，制定《共同纲领》草案过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④。毛泽东政治协商运作机制体现了团结多数、尊重少数的鲜明特色。

3. 互相监督、荣辱与共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实践中坚持互相监督、荣辱与共。“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⑤，而且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⑥，需要各民主党派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提意见，这样可以更客观全面地了解问题，制定的方针政策也会更恰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其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福祉、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协商形式，“广泛接受批评和监

① 齐卫平 《政治协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品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②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各单位代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督”^①，“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②，有效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腐败滋生。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话中就提出了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及与民主党派关系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③同年9月，中共八大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所谓荣辱与共，是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协商合作过程中，真诚相待，相互支持，荣誉共享，患难共渡。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共渡难关。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持与民主党派合作，在建立“三三制”政权时，毛泽东对政权组成成分给予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保障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合法权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名，其中有3位是民主党派人士，分别是民革党员宋庆龄、李济深和民盟盟员张澜。新中国成立后，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分别是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和民建会员黄炎培，除此之外，在国家的其他重要岗位中，还有很多民主人士。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遭到破坏，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政治协商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但各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受了严峻考验，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拥护。总体而言，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用协商合作实践诠释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政治协商是毛泽东开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贯穿于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宏大历史进程中，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毛泽东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④凡事同人民商量得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同人民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接近目标，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⑤，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苏曼丽 张叶婷）

①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②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③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④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⑤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